

淺談《史通·疑古》篇中的「疑古」思想

王瑞傑

本文除了對於劉知幾著述《史通》的背景、動機以及各篇大意作了大略的介紹外，主要的重點在於討論《史通·疑古》中的思想內涵。《史通》自傳世以來，雖曾遭受過部分士子的批評與否定，但仍無損於此書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價值與地位。其中的〈疑古〉、〈惑經〉等篇，對於吾人研究中國上古史實具有相當的啓發性價值，本文擬就〈疑古〉篇中的內容，來約略地探討其思想內涵，而其所蘊含的「求真」、「求實」的「疑古」精神，可說是開啓了民初疑古學風的先河。

關鍵詞：劉知幾、史通、疑古

壹、前言

梁啓超對劉知幾及其《史通》有相當高的推崇，他說：「自有史學以來，二千年間得三人焉，在唐爲劉知幾，其學說在《史通》；在宋爲鄭樵，其學說在《通志》；在清則章學誠，其學說在《文史通義》。」¹ 由此可見《史通》之價值。又梁氏亦謂：「劉氏事理縝密，識力銳敏，其勇於懷疑，勤於綜核，王充以來，一人而已。其書中〈疑古〉、〈惑經〉諸篇，雖於孔子亦不曲徇，可謂最嚴正的批評態度也。」梁氏對於〈疑古〉篇的內容基本上也是予以肯定的，由此更可見〈疑古〉篇在今日所具有的價值與意義。

本文的目的即在於透過幾位當代學者對於〈疑古〉篇的探討，以明知幾在〈疑古〉篇中所寓意的精神與內涵。

貳、《史通》說略

《史通》作者劉知幾，字子玄，生於唐高宗龍朔元年，卒於玄宗開元九年（西元六六一至七二一年），享年六十一歲。有關劉知幾的生平，在《舊唐書》卷一〇二及《新唐書》卷一三二的「劉子玄傳」中皆有詳載。另《史通·自敘》可視爲知幾之自傳，其中除敘述了知幾著作《史通》的用意外，對其求學及志趣的發展歷程亦有所述及。

「於劉知幾所生長的家庭中，洋溢著濃郁的學術氣氛，在如此環境的薰陶下，孕育出他對學問尤其史學的高度興趣」。² 同時，「劉知幾從小喜愛史學，好批評人物史事，有獨立思考，不苟同於世俗陳說的秉性。」³ 因此，

¹ 梁啓超，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（台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民國 74 年台十五版），頁 24。

² 邱添生，〈劉知幾的史通與史學〉，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》，第 9 期（民國 70 年 5 月），頁 60。

³ 莊萬壽，〈史通通論〉，《國文學報》，第 23 期（民國 83 年 6 月），頁 5。

知幾在這樣的成長背景及獨特的秉性下，遂有了《史通》這部曠世名著流傳後世。

此書之完成約在唐中宗年間。劉知幾在中宗即位之次年，即他四十六歲時，以身兼史官的身分，在前後三年的時間私下撰寫《史通》，然卻招致非議，竟有人上報朝廷，謂其：「史官不寫國史，而私自著述。」五十歲時，《史通》二十卷五十二篇大致完成，時值中宗景龍四年。⁴ 不過，這些文稿似乎在武后長安二年以前即已陸續在撰寫了。⁵

劉知幾撰述此書之動機可分為兩點來看：「(一)、記錄長期積累的歷史研究見解；(二) 宣洩被壓抑的史官獨立著述精神。」⁶ 這從《史通·自敘篇》即可窺知。而《史通》的內容架構及各篇大意，除〈體統〉、〈紕繆〉、〈弛張〉等三篇已亡佚外，其他四十九篇則大致如下：⁷

篇名	內容大意
◎內篇：為史書體例與史書編纂方法	
六家	<p>諸史分為六家：</p> <p>尚書家：帝王君主的言論、號令。</p> <p>春秋家：記以帝王君主為中心史事的編年史。</p> <p>左傳家：記史事的編年史。</p> <p>國語家：諸侯國別史。</p> <p>史記家：自上古到當代的通史。</p> <p>漢書家：一個王朝的斷代史。</p> <p>以上尚、春、國、史四家之體已廢，惟左氏、漢書之體存後。</p>

⁴ 參莊萬壽，〈史通通論〉，頁 4。

⁵ 邱添生，〈劉知幾的史通與史學〉，頁 56。

⁶ 參莊萬壽，〈史通通論〉，頁 5-6。

⁷ 以下之內容大意係摘要整理自莊萬壽，〈史通分篇提要〉，《教學與研究》，第 15 期（民國 82 年 6 月），頁 1-20。

二體	<p>編年體：《春秋》（《左傳》）、荀悅《漢紀》、張璠《後漢紀》……</p> <p>紀傳體：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華嶠《後漢書》……</p>
載言	<p>紀傳（例傳）以敘事為主，不宜插入文章，如《史》、《漢》中〈賈誼傳〉、〈晁錯傳〉、〈司馬相如傳〉等。文章應抽出，別立一「書」之中，如帝王制冊、詔令，別置〈制冊書〉；群臣章表，別置〈章表書〉等。</p>
本紀	<p>為帝王本人編年史。首代帝王的先人不得列入本紀。</p>
世家	<p>諸侯國別史。《史記》世家之體，而不該把陳勝及漢代封王者，列入世家。《漢書》之後無世家之體。</p>
列傳	<p>人臣的傳記。項羽應為列傳，《史記》不該入本紀。</p>
表曆	<p>史書的世系表繫以年月，因稱表曆，表可用於譜牒。史書因帝王、諸侯、公卿的紀傳，都有家族、職官的年月資料，因此不必再有表，只有「列國年表」還有些作用，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沒有漢人，卻編入《漢書》。</p>
書志	<p>文化史的體裁，《史記》稱書，《漢書》稱志。</p> <p>應去除之目：天官書（天文志）、藝文志、五行志。</p> <p>應增加之目：都邑志、方物志、氏族志。</p>
論贊	<p>史家對某歷史人物、事件的評論，置於篇後。</p> <p>史論在於「辯疑惑，釋凝滯」，後世皆「華多於實，理少於文，鼓其雄辭，誇其儷事」沒有疑事，不必有論。</p>
序例	<p>序是置於篇前，總括篇旨，以說明作此篇之用意的文章。</p> <p>例是史書的體例。</p>
題目	<p>指書之名。史書之名，編年最好用「紀」，紀傳最好用「書」。</p> <p>篇名要名符其實。</p>
斷限	<p>通史、斷代史的起訖年限，若資料超越時限，要割愛不可收入。</p>

編次	史書的編輯結構與體系。
稱謂	對歷史人物的正統或非正統的名位稱呼。
採撰	對史料的採集、判斷。
載文	歷史引用原始詞章、詩文的原則—不虛美、不隱惡。 魏晉以後史書引詞章的五種過失：虛設、厚顏、假手、自戾、一概。
補注	史書的補注。即補釋及注解。
因習	斷代史因有特殊的社會狀況，不可一味沿襲前代歷史的詞彙、體例、史觀。
邑里	歷史人物的出身鄉土。重視生前所活動的鄉土地，反對僑置，虛繫地名。肯定現在住地，認同所居鄉土。反對郡望，姓望，不可攀附權貴豪門的原有籍貫，來哄抬自己的地位。
言語	史書中所引口語對白的分析。一代有一代的語言，史家應該取真切自然的當代民間口語，不可仿效古人的語言，以反映歷史真象。
浮詞	史書用詞不可浮濫不實。
敘事	史書記錄史事的重要與方法。敘事有三種方法：尚簡、用晦、妄飾。
品藻	鑑別歷史人物品類、高下。歷史人物的正反角色是跨越時代的，史官的責任要能「定其同科，中其異品」。
直書	真實而直接的反映歷史。歷史的任務是讓賊臣逆子、淫君亂主的醜惡的事跡，顯露社會，流傳千古。
曲筆	曲折隱瞞歷史的真象。與直書對稱。
鑒識	對史書價值的評鑒與識別。鑒識的困難：物有恆準，而鑒無定識，欲求銓覈得中，千載一遇。
探蹟	對前人錯誤的史論，加以探討辯正。
模擬	對前史體例寫法的仿作。

書事	史書記錄史事（取材）的範圍。劉知幾三科：敘沿革、明罪惡、旌怪異。
人物	史書收錄人物的原則。兼收善惡，惡可以誠世，善可以示後。
覈才	考核史才。
序傳	論史家的自序。自敘的原則：隱己之短稱其所長，而不謬，即為實錄。
煩省	論史書內容的繁多與簡約。史科遠古簡，略晚近詳贍。
雜述	史部的雜著。廣義的史學體裁。 偏「紀」—王朝的一段或亡國末帝的傳記。 小錄—私撰的人物小傳。 逸事—記國史以外的逸事。 瑣言—街巷傳聞的小說。 郡書—地方士族名人錄。 家史—豪門家族史。 別傳—被表揚的封建社會人物。 雜記—怪異見聞。 地理書—地方地理。 都邑簿—都市志
辨職	辨識史家的職責。
自敘	劉之幾《史通》自序。
◎外篇：為史學的源流與經史的批判	
史官建置	歷代史官沿革及職責。本篇為中國最早而有系統的史官史。
古今正史	古今正史的源流。本篇為中國最早而有系統的史籍史。
疑古	懷疑《尚書》古史不實者十事。
惑經	批評孔子所修《春秋》經之「未諭者」十二事及「虛美者」

	五事。
申左	申張《左傳》勝於《穀梁》、《公羊》的優點。
點煩	以色筆點去史傳煩贅的文字。
雜說上	〈雜說〉係雜論諸史的札記，共六十五條分上、中、下三篇。 上評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公羊》各二條，《汲冢書》一條、《史記》八條、漢諸史十條。
雜說中	評諸晉史六條、《宋略》一條、《後魏書》二條、北齊諸史三條、《周書》一條、《隋書》一條。
雜說下	評諸史六條、別傳（非國史之傳）九條、雜識十條。
五行志錯誤	班固《漢志》抵牾者多，其中〈五行志〉之蕪累尤甚。其錯誤有四科：一科引疏失宜；二科敘事乖理；三科釋災多濫；四科古學不精。
五行志雜駁	評《漢書·五行志》中關於《春秋》時事十五條。
暗惑	古來傳說相習而不知明察的疑惑。
忤時	唐中宗景龍元年（707A.D.）兼修國史，受權貴監修者之干擾，於次年上書監修蕭至忠等以求罷去，本篇主要所收錄此書，稱其不可為史者有五故： 古史成於一人，近則多員，致相觀望，曠廢時日。 近世史官，資料自取，難有完備。 近世史官，怕得罪權貴，不敢直筆。 受監修者所控制，無從下筆。 分配工作，權貴不明。

從以上表格中所列《史通》的內容來看，可知此書實為一部「體大思精」之史學理論著作。錢穆即曾謂此書：「《史通》則可說是中國一部史學通論，也幾乎可以說是中國唯一的一部史學通論，所以這書成為一部特出的書。」

⁸ 今人龔鵬程也謂：「劉知幾的《史通》，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嚴整的史學理論著作，所論廣及史籍源流、體例、編撰方法、史官建置沿革、史書得失等等。寫成當時，與劉知幾一同參預國史修撰的徐堅就曾讚嘆說：『居史職者，宜置此書於座右』，似乎評價甚高。後人對這部書，基本上也還是稱許的，如黃山谷云：『論文則《文心雕龍》，評史則《史通》，二書不可不觀，實有益於後學』，可見大家是把它看成中國史學理論之代表作的，地位猶如文評裡的《文心雕龍》。」⁹ 邱添生師亦謂：「劉知幾所撰《史通》一書，乃是中國首度出現之歷史批判的專著。……劉知幾《史通》的出現，並不僅具有開創歷史批判之體裁的意義而已，同時也說明所謂歷史批判或史學方法論的成立，實由於史學領域的明確自覺始有可能。換句話說，所謂『史評』專著的出現，便意味著史學的真正確立。」¹⁰ 由此可以看出，《史通》一書的價值不僅止於呈現知幾撰著此書的「史意」，就史學史發展的意義而言，實開啓了前人之所未發，確立了史學獨立的地位。

參、〈疑古〉篇中所見「疑古」思想

《史通·疑古》篇蓋主要針對《尚書》中所見史事提出了十個疑點，在本篇序的最後即道出了知幾著作此篇的心意：

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，愛憎由己者多矣。加以古文載事，其詞簡約，推者難詳，缺漏無補。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，蒙然靡察，有如聾瞽。今故訐其疑事，以著於篇。凡有十條，列之於後。¹¹

不過，清代學者錢大昕對於知幾著作〈疑古〉、〈惑經〉等篇的動機則以為是「藉論聖非經大言蔑古為依托，然後對官修史學作嚴厲的批判。」¹²「劉

⁸ 錢穆，《中國史學名著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民國 62 年初版，74 年五版），頁 153。

⁹ 龔鵬程，〈《史通》析微〉，《幼獅學誌》，第 20 卷第 4 期（民國 78 年 10 月），頁 29。

¹⁰ 邱添生，〈劉知幾的史通與史學〉，頁 51。

¹¹ 唐·劉知幾，《史通通釋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民國 82 年），頁 381。

知幾對儒家經典的批評，完全是言不由衷的，不過是藉以避禍而已。」¹² 今人遼耀東則認為「錢大昕的這種推論，不僅十分有趣也是非常可能的。因為劉知幾正處在一個由宮闈鬥爭，擴大影響及整個歷史的時代，正如他自己所說『韋武弄權，母媼預政』的時代，當時的情況是『時吏橫酷，淫及善人，公卿被株者踵相及。』稍有不慎就會自取其禍，對週身之道是不能不留意的，劉知幾的《史通》就是在當時複雜的情況下出現。」¹³ 因此〈疑古〉、〈惑經〉篇的寫就似乎有「借古諷今」的意味，並以此而遠離人身的災禍。

不過，知幾在〈疑古〉、〈惑經〉篇中對傳統經典的批判，卻也引起了千年以來不少爭議的聲音，而這兩篇也是《史通》一書中最惹人非議的部分。例如，「明朝胡應麟曾認為《史通》的文字淺猥、論點瑣屑，又抨擊它：『甚矣，唐人之陋也！劉知幾《史通》稱舜囚堯、禹放舜、啓誅益、太甲殺伊尹、文王殺季歷、成湯偽讓、仲尼飾智於愚。斯數言者，戰國有之，然識者無弗謂虛也。胡子玄驟以為實耶？至謂舜、禹、湯、文，同於操、懿、裕、衍；而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之妄，過於沈約、王沉，斯名教之首誅矣！』」『《史通》前後議論，務以春秋亂臣賊子臆度前聖』『妄意文王得位，亦如商臣許止之為』『真所謂言姦而辯，記醜而博者』。後來尹享山讀黃叔琳《史通訓故補》後，也寫信給黃氏，說他讀到外篇疑古十條，不禁髮指，不知劉知幾是何肺腸，竟然非聖無法到這種地步。建議黃叔琳刪去這一篇。黃叔琳考慮後，果然刪掉了〈疑古〉及〈惑經〉中的一部份。後來紀昀的《史通劄記》也依此例，削去了〈惑經〉中『是非謬於聖人』的大段文字。浦起龍的《史通通釋》雖然仍保留了這兩篇，卻批評它是『佹辭蟻古以召鬧』，不認為那有什麼價值。對黃本驥《癡學》第七卷〈信古錄〉專駁〈疑古篇〉一類的作法，也覺得沒什麼意思，主張存而不論即可。」¹⁴ 由此可知，〈疑古〉篇在有些學者的眼中被認為是「離經叛道」，對於深受儒家思想教化的傳統士子而言，〈疑

¹² 遼耀東，〈《史通》〈疑古〉、〈惑經〉篇形成的背景〉，《當代》，第10期（1987年2月），頁62。

¹³ 同上註。

¹⁴ 龔鵬程，〈《史通》析微〉，頁31。

古〉篇中的主張無疑是挑戰古聖先賢權威的逆流。

然而以上傳統士子對〈疑古〉篇的看法是否有失之公允？在論此之前，吾人可以先來了解〈疑古〉篇的內容，而其所疑事簡要言之則有以下十條：

15

- 一、堯舜時有四凶、不仁者，〈虞書〉安可謂之「克明俊德」？
- 二、依《汲冢書》，疑舜乃奪堯而自立，〈堯典〉稱讓國，圖虛語耳。
- 三、疑舜被放逐南方而死，〈舜典〉謂「陟方而死，不可信。」
- 四、疑益要廢禹，立啟而後自立，因失敗見誅。
- 五、疑湯以力制夏桀，虛讓務光，以去己罪，再通務光自殺而自立，《尚書》稱湯有「慚德」，乃有意隱諱。
- 六、《五經》厚誣桀、紂之罪過，子貢、劉向已疑之。
- 七、武庚為救國抗周而亡，非所謂「頑民」。
- 八、周本臣於商而自僭王號，自行征伐，《論語》稱周德之大，不實。
- 九、太伯迫於勢而逃亡蠻夷，轉禍為福，非《論語》所謂「至德」。
- 十、周公耀威震主，使兄弟猜疑而又遽加誅戮，薄於手足之義，《尚書》引為美談，可疑。

從以上十疑的內容來看，可見知幾實具有獨立思考批判的特色，擺脫傳統以來對古史認知的框架，所疑所論皆能發前人之所未發且言之成理。而從幾位當代學者對〈疑古〉篇的看法，可以看出〈疑古〉篇內容的價值。

金毓黻即謂：「至於疑古篇以堯舜夏禹之禪讓為可疑，惑經篇以春秋有五虛美十二未喻，不必非聖侮經之咎，更脗合近代學者治史實事求是之精神，凡此諸端，皆非可與其他史家，取而並論者也。」¹⁶

張舜徽說：「《史通》一書，雖係一部專論歷史方法的著作，但劉知幾在論歷史方法之中，亦嘗寓褒貶與奪之意。其中〈疑古〉一篇，題目〈疑古〉實即諷今。」¹⁷

¹⁵ 因《史通·疑古》所列十條篇幅甚多，為求簡要，係整理自莊萬壽，〈史通分篇提要〉，頁 15-16。

¹⁶ 金毓黻，《中國史學史》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民國 83 年七版），頁 272。

¹⁷ 張舜徽，《史料與史學》（台北：木鐸出版社，民國 76 年），頁 166。

郭紀青謂：「用客觀的態度，撰述新史。」¹⁸「提倡疑古的精神及方法。劉氏事理縝密，識力銳敏，勤於綜核，勇於懷疑。……其對於傳說，後出諸說，作者成見……皆辨析甚明，其識見之卓越，目力之銳利，不妄言，不苟信，能實事求是，作嚴正之批評，皆非後人所能反。……其疑古的方法，有三端：1.一事記事，前後矛盾，因而斷定其史事之妄繆者。2.以可以信託之書籍為反證，以明史事之謬誤者。3.用推理方法而疑其事者。」¹⁸

莊萬壽謂：「在〈疑古〉及〈惑經〉兩篇可看出他繼承了王充，高舉抗拒經典古訓的大纛，使他走出了傳統的窠臼，而開創了前人所未有的進步史觀。」¹⁹

綜觀以上所列幾位學者的看法，他們均肯定了〈疑古〉篇的價值，認為知幾實具有客觀、實事求是的治史精神，堪為後世之表率。

雖然如此，亦有學者對〈疑古〉篇採取了不以為然的看法，如錢穆即謂：「劉知幾對於古代的中國史懷疑，他說：『倘漢魏晉宋之帝君生於上代，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，史官易地而書，各敘時事，校其得失，固未可量』這樣一講，就對全部歷史泛起了一種虛無的看法。那是一種極刻薄、極輕浮的虛無主義。」²⁰ 錢氏認為〈疑古〉篇中所論是一種「虛無主義」，而他也說：「劉知幾僅通史學，不通經學，這是劉知幾學術上之偏處、短處。」²¹ 錢氏所論似乎仍是以傳統士子「崇經尊儒」的立場來看〈疑古〉篇的價值，忽略了史家「求真」的客觀治史立場，就此點來看，錢氏所言或有失之偏頗之處，他並沒有真正了解知幾的「史意」何在。其實，「知幾並不贊成史官因其強烈的道德關懷以致扭曲史實，這觀點便相當接近近代史家蘭克『暴陳往事真相』的要求。《史通》中〈疑古〉〈惑經〉兩篇，知幾針對《尚書》《論

¹⁸ 郭紀青，〈劉知幾與史通〉，《台中師專學報》，第10期（民國70年6月），頁8、11-12。

¹⁹ 莊萬壽，〈史通通論〉，頁18。

²⁰ 錢穆，〈中國史學名著〉，頁160。

²¹ 同上註。

語》及《春秋》等書指出其不符史實的例子，可茲證明。」²²

因此，處在今日來看〈疑古〉篇的價值，吾人應該擺脫傳統儒家史觀的思維模式，而從史學家求「真」、求「實」的治史標準來看〈疑古〉篇中所主張的論點，更可見其歷久彌新的價值與意義。儘管知幾所論未必完全符合事實的真相，而由於年代渺茫也已殊難考證，但無論如何，其所開「疑古」之風對於後人治史實具有相當的啓發作用。

肆、結語

劉知幾〈疑古〉篇所呈現的，不只是想要探求上古「史事」的真相而已，實已蘊含了史家求真、求實的客觀精神，更象徵了「史學」不再只是解釋「經學」「微言大義」的附庸，而實具有其獨立的超然地位，所謂「六經皆史」的精神在〈疑古〉篇中已可充分的看出。經書所述，如《尚書》已不再是不可挑戰的「聖人」之言，其中所載是可以以史家求真、求實的態度來加以檢覈的。

「(〈疑古〉、〈惑經〉) 所論各端，雖也有不周延、乃至相鑿柄，而為後世學者所指出，但皆為追求實錄的史學而疑古惑經的，他超過了王充的觸角範圍，比較有系統的把最重要的二本古史—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抽出問題加以駁辨，成為漢魏六朝以來疑古論的大師，清代辨偽學風熾盛，崔述著《考信錄》，自稱是『推廣《史通》之意』，只是劉知幾並不像崔東壁的宗經衛道。民國初辨偽疑古，如江海浪潮，溯其源委，劉知幾堪稱為現代疑古學派的先驅。」²³ 因此，〈疑古〉篇不只是寓意了史家治史所當具有「求真」、「求實」的精神外；而在中國史學史的發展上，實開民初「疑古」學風之先河，具有其一定的歷史地位與價值。

²² 彭雅玲，〈史論歷史褒貶〉，《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》，第 25 卷第 2 期（民國 81 年 12 月），頁 198。

²³ 莊萬壽，〈史通通論〉，頁 26。